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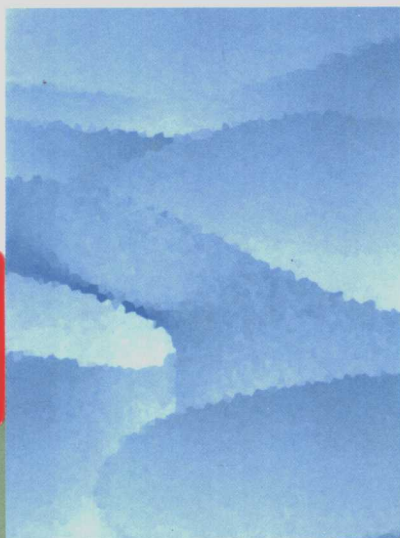
陈德军 著

乡村社会中的革命

——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

(1924~1934)

上海
大学
出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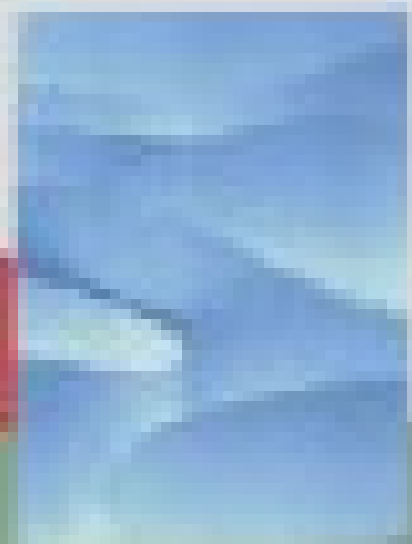
XIANGCUN SHEHUI
ZHONG DE GEMING
YI GANDONGBEI
GENJUDI WEI
YANJIU ZHONGXIN

中国农村研究

乡村社会中的革命

——以韩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
(1934—1945)

中国农村研究



中国农村研究
中国农村研究

中国农村研究
中国农村研究

乡村社会中的革命：

——以赣东北根据地为中心(1924—1934)

陈德军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 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中心：
1924～1934/陈德军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8

ISBN 7-81058-735-8

I. 乡... II. 陈... III. 农村革命根据地-研究-
江西省-1924～1934 IV. K2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5280 号

乡村社会中的革命
——以赣东北根据地为中心(1924 - 1934)

陈德军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36)

www.shangda press.com 发行热线(021)66135110

出版人：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字数 223 千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100

ISBN 7-81058-735-8/D·063 定价：17.20 元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老师顾云深教授和戴鞍钢教授，是他们拨亮了我黯淡的心灵。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中国革命的农村战略与地方实践	15
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农村战略的形成与中共的反应	16
二、最初的引入：革命知识分子与农村战略在赣东北的 早期实践	34
三、“群众膜拜”：国民革命高潮起伏时期的农村战略与 地方实践	44
四、革命精英的离城返乡与农村战略的深入实践	63
第二章 农民参与革命方式的类型分析(1927—1934)	78
一、参与方式的类型分析(Ⅰ)	80
二、参与方式的类型分析(Ⅱ)	87
三、参与方式的类型分析(Ⅲ)	96
四、类型的再生产	104
第三章 中共的地方组织及其支持下的其他革命组织	113
一、乡村社会的无组织化和革命组织的出现	114
二、革命组织和它的“敌人”	134
三、严密组织中的乡村社会	155

结 语	179
附 录	189
一、赣东北十五县民乱年表(1644—1924)	189
二、赣东北地区民乱折线图(1900—1924)	192
三、江西省地势图	193
四、国民革命军北伐途经赣东北地区示意图	194
五、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与全国其他农村革命根据地形势图 (1930年夏)	195
六、长征后红军在南方活动区域示意图(1934年秋至1937年秋)	196
七、上饶县苏区示意图(1930年—1934年)	197
八、玉山县革命根据地示意图	198
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横丰县形势示意图	199
十、贵溪、余江两县苏区示意图	200
十一、万年县苏区斗争形势图(1930年至1932年)	201
十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婺源县革命活动示意图	202
十三、德兴苏区革命形势图	203
十四、铅山县苏区示意图(1930年至1935年)	204
十五、弋阳县苏区政治形势图(1931年)	205
十六、余干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形势图	206
十七、波阳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形势图	207
征引文献	208
一、未刊已刊档案	208
二、专题资料集	208

三、理论著作	211
四、报刊	211
五、地方志和地图册	212
六、中文版专著论文	213
七、英文版专著论文	220
后 记	224

导 言

大约半个多世纪前,革命的红尘在中国基本落定。然而,革命从源起、行进并且得以获取最后成功的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在随后的年月里,依然以各种变化的,或者未曾变化的形式塑造和限制着新中国成千上百万男男女女的行动和命运。在这个过程中,它愈益清晰地向人们表现出自己的一些顽强的结构性特征。

因此,革命是一条通往认识中国社会的路径。尽管其间磅礴迷离,人们还是可以通过革命这条路径,探寻、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内在的深层世界。事实上,自从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降临中国大地以来,无论是参与还是旁观,甚至是反对这场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对革命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论反思,一直在不断深入地、多方面地进行着,其兴趣和努力至今持续不已。这是人类自觉性的生动体现。选取时限为1924—1934年,以赣东北根据地为中心作一个案,辩证地继承这笔巨大的理论遗产,在以往积累的成果上丰富、推进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认识,应该是一项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一、主 题

大道流行,充塞天地。因而,倘若要判断革命与社会之间内在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否在不同的区域呈现为一致的性质和样式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就可以选取某一特定的时段和特定的地区切入,作为探讨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之间关系的起点,并且还可以由此去证实或证伪一些相关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大多

出自于西方学者,并在全球有着广泛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利用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和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努力分辨各种理论在有关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关系认识上的偏差和虚幻,^{〔1〕}以重现历史的真实,就极其必要。

不过,以1924年至1934年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还有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1924年3月,方志敏在南昌经赵醒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2〕}他是赣东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开创赣东北根据地的另一个重要的革命领袖黄道也是1924年秋在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中共党员的。^{〔3〕}此后,中共党员在赣东北地区陆续增多。共产党在赣东北的出现,是赣东北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而且,标志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战略转折的“五月指示”,在1923年11月的中共三届一中会议上被采纳。中共开始主张农民是中国国民运动的最大动力的革命纲领。^{〔4〕}这一年年终,方志敏在弋阳县九区家乡领导农民,开展了向当地财主邵襄臣的借谷运动。^{〔5〕}1924年的11月,方志敏又与赵醒侬等在南昌市郊区建立了江西第一个农民协会。^{〔6〕}因此,1924年对于赣东北人们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完全有足够的历史分量来表征我们所研究的时段的开始。

〔1〕 在利用地方性知识的时候,我们充分理解并始终贯彻皮埃尔·布迪厄倡导的“认识论断裂”。他的“教诲”具有启蒙意义:“社会预先建构的观念,其力量就在于,它既铭刻于事物中,又扎根在思维里。它把自己掩盖在不证自明的外衣下,却……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因此有必要和那些表面看起来是常识、令人感到习以为常,或者使人自以为是为探寻这些东西的实证主义传统所欣赏和推崇的一切划清界限。〔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377页。

〔2〕 方志纯:《关于方志敏入党时间的复信》,中共弋阳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共弋阳党史资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第156页;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1935年3月)》,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方志敏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3〕 参见陈群哲、陈荣华、刘勉玉、李国强:《黄道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6页。

〔4〕 《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1923年1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00—201页。

〔5〕 方梅:《方志敏全传》,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66—69页。

〔6〕 《附录:方志敏生平表》,《方志敏文集》,第378页。

而以 1934 年为研究对象的截止时限,则是因为 1934 年 11 月底至 12 月初,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和红二十师,从德兴重溪出发,告别了赣东北苏区的父老乡亲。此后,方志敏即使试图折回赣东北苏区,但由于未能冲破金竹坑封锁线,被迫辗转于怀玉山区,没有实现重返老苏区中心地带的计划。〔1〕至此,赣东北根据地几为敌摧残殆尽(参见图 5)。

1927 年的“八一”南昌起义前后,赣东北地区的革命局面确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在此之前的农民运动场面盛大,积极参与者却仅限于人数不多的年轻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农会积极分子,大多数人只是热闹的观众。“八一”之后,包括赣东北在内的整个江西政治开始反动,然而其对革命最大的影响是挤掉了早先革命运动中的“水分”。而且,大革命时期在农村发展的中共基层组织和农民武装,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这些组织和武装,以及期间所培养的一批党的骨干和群众领袖,还为以后革命的继续发展准备了坚实的基础。〔2〕在整个“八一”前后两阶段,革命继续发展的趋势比革命的逆转回落趋势显著,反差对比在远离全国政治斗争中心的赣东北地区并不突出尖锐。实际上,在许多偏僻的农村地区,情况大体上亦如此。所以 1927 年不是打通 1924—1934 年这个时段的障碍,或者说,从革命发生发展的角度看,赣东北地区这十年的历史没有在 1927 年出现严重断裂。

为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在研究和论述的过程中也对 1924—1934 年这个时限作适当的前后延伸。

(2) 赣东北地区及其周围的地方,后来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时,其中心区域和游击区,以当时的行政区划而言,先后包括江西的弋阳、横丰、德兴、贵溪、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玉山、广丰、乐平、浮梁(含景德镇)、都昌、湖口、波阳、彭泽、余干、东乡、资溪、金溪,福建的崇安、建阳、建瓯、邵武、光泽、浦城、福鼎、福安、寿宁、屏南、松溪、政和,浙江的江山、开化、衢县、平阳、常山、遂昌、云和、泰顺、永嘉、青田、瑞安、庆

〔1〕《附录：方志敏生平年表》，《方志敏文集》，第 402—403 页；《方志敏全传》，第 445—446、462—474 页。

〔2〕邵式平、汪金祥、胡德兰等：《闽浙皖赣（赣东北）党史》，方志敏、邵式平等著：《回忆闽浙皖赣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14 页。

元、景宁,安徽的婺源、祁门、东流、秋浦、休宁、太平、泾县等 52 个县。^{〔1〕}从地理特征看,它们基本上可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参见图 2)。位于江南丘陵的东部地段,其西面是鄱阳湖区,北面和东面是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南面是武夷山区,西南面是抚河流域。信江流域贯穿其核心地带。整个区域内部通过经济和社会的交往,相互连接。在政治上,由南昌、福州、杭州和芜湖等四个城市围成一个闽浙皖赣四省边界地区。

1930 年 10 月,中共中央指出:“赣东北苏维埃区域是六大苏维埃根据地之一。”^{〔2〕}毛泽东则把赣东北根据地称为“方志敏式”,与“朱毛式”、“贺龙式”和“李文林式”等革命根据地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是“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的”,“波浪式向前扩大”,正确地发展根据地的模范。^{〔3〕}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以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旁及周边地区,在地理上和历史上都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的区域单位。

更为重要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其他根据地或由相当的正式的革命军队创建,或由中共所掌握的白军帮助建立,但是方志敏他们几乎是“白手起家”,在赣东北乡村最底层,扎根于农民社会,从开始的弋(阳)横(丰)两个县数个区发展到最后包括闽、浙、皖、赣 50 多个县。作为赣东北人,对自己家乡的先辈们不平凡的革命业绩无比的景仰,他们创立这个根据地的过程很值得追思和研究,他们为祖国和人类的美好明天而艰苦卓绝地奋斗以至于牺牲的精神,永远为人缅怀和纪念。

〔1〕《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编写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1 页。

〔2〕《中共中央给赣东北特委并红十军前委的指示信(1930 年 10 月 28 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第 222 页。

〔3〕参见《抗战以前选集(一)》(中共中央北方局 1944 年),第 139 页。

还有,对各个区域近代以来的情形进行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作品很多,比如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山东地区、两湖地区、巴蜀地区等等;尤其是对与赣东北相毗邻的徽州地区和福建地区的研究,已自成体系,别具特色。然而,对赣东北地区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几乎等于一片无人涉及的学术荒原。即使从革命史角度来进行的根据地研究,相对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其他根据地,也很不充分;与中外学者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深度而细致的研究相比,更是形成强烈的反差。

(3) 以往对赣东北地方革命历史不多的研究中,更经常地采取自上而下的、宏观的并以对政策的分析评价为主的方法和策略。

所谓“自上而下的”,是指它们不是从草根农民的视角出发,来感受、理解和描述区域社会中的日常生活、心理情感、价值信仰和人际交往。研究者的尺度代替了农民自己的尺度。跨地方的历史事件在地方农民的生活中引起的细微却蕴涵厚重的波澜,以及农民对跨地方重大事件赋予自己独特的阐释和意味,在“自上而下的”研究视野里,一律抹去,或者一律涂抹上非地方的色彩。地方历史不再有自己的神秘性,对于他者的不可化约性。它被跨地方的、国家的观点逻辑“透视”无遗,按照它们的历史被切割肢解,亦步亦趋地重构。“一个地方的历史被纳入到一个跨地方的历史进程中去”。^{〔1〕}草根农民在这种历史中找不到自己,相对于精英、领袖和英雄(其地方性身份被当作落后的、封建的东西置诸一边、闭口不提),他们可有可无。在这种历史中的精英眼里,草根农民也构不成边际相当宽泛模糊的历史极限,精英们的极限就是历史的极限。跨地方的、国家的历史不但不关注、充分评估地方社会中的盘根错节在形成地方历史时的地位和影响,而且,这些枝桠交错的地方人文萝蔓甚至不是跨地方的、国家的精英们一意孤行的障碍。精英们在创造历史中的领导、组织和感召作用理应予以充分的评价,然而,地方历史既是精英们行动的基础和限制,草根农民对于自身行动控制权的

〔1〕 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7页。

转让也不是不需任何成本、一蹴而就的。

可是,由于他们对地方革命历史的研究往往是“宏观的”,不但地方的特殊性、地方农民的历史文化被视为无足轻重,革命领袖、革命精英在宏观历史趋势和现实大局面前也变得黯然失色,他们对于宏观历史趋势和现实大局的判断、把握和运用,也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于他们的历史作用,似乎没有必要大惊小怪,革命历史没有必要为他们而感到受宠若惊。“宏观的”研究以某种庸俗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地方革命的起源和发展,形而上学地把阶级斗争的模式套用到赣东北革命身上。它们一开始就研究赣东北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1〕并不去推敲“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地主与农民”之类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否遗漏许多重要的信息,而正是这些被遗漏的情况形成了以后革命的复杂性。而且,他们在两分法的指导下所举出的数字和现象,作为阶级怨恨、对抗的依据,不但不以为自己实际上是在为农民的知觉感受“越俎代庖”,〔2〕还以为这些数字和现象几乎直接等同于革命的发生和进行,在这之间是不需要革命领袖和革命者什么努力和成本的。历史的轨迹已经安排妥当,革命者只是应约而来做“描红”。最为可疑的是,认为革命者汇成洪流,就像杜鹃花一样,季节一到,满山遍野皆是,不招而来。在这种宏观的经济—阶级的研究中,革命者的主体性被降到了最低点。

“自上而下”的视角对草根农民不感兴趣,因此偏重于革命领导机关的计划、政策和意向,偏重于对少数革命精英的思想或行踪的研究。假如仅是研究革命的领导机关或者革命精英,这样的偏重是很必要的,无可非议的。但是,假如以政策文件的内容就是赣东北地方革命历史的实际,就很成问题。在没有意识到政策文件的起草是由当地农民社会和革命情况所引发,而政策的贯彻又会产生变异的时候,我们不可能通过这些政策文件触及革命的真实。在以政策分析评价为主的研究中,某一项革命政策就是革命政策而已,它是静止的、单一的、确定不变

〔1〕 比如《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编写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页。

〔2〕 也可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03—206页。

的。然而,如若在分析评价某一革命政策时引进草根农民,将会使研究更加生动、切近实际,对政策的评价也更为恰如其分。事实上,充分考虑革命政策的制订者与政策所面向的草根农民之间的张力,正是通向理解革命发生、发展到胜利的社会历史基础的一条资料丰富的研究路径。

在以往研究的取向下,赣东北农民社会的内在特性在理解革命时几乎缺席,没有予以恰当的地位。本书试以此方向作一弥补的研究。

二、学术背景

最早系统地回顾、反思了赣东北地区革命历史的,是1935年3月方志敏在狱中所写的自传性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篇文献为以后进行这一地区革命情况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生动的细节材料。同年6月,方志敏又研究总结了赣东北苏维埃历史。但是现在仅存“序言”和“第二章”,且手稿多有残缺。

1945年3月,来到延安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人邵式平、汪金祥、胡德兰等,经过几次回忆座谈,写成了《闽浙皖赣(赣东北)党史》。由于环境安定,参与人数有十多个,因而比方志敏一个人在狱中所写更全面、具体,也更系统。而且,基本上以一个月后在中共六届七中扩大全会上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裁量人物事件,并附加了方志敏被捕之后的一段历史。

第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是方志纯的《赣东北苏维埃创立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这是方志纯为了完成方志敏未竟的《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而写的。由于已有前述两部著作为基础,再加上1949年以后大量相关史料的征集和深入的学术研究成果出现,所以,个人主观痕迹和政治功利意识都显著淡化,具有较高的史料和史学价值。

以上的这些著作出自历史当事人对自己亲身领导和经历的赣东北革命历史的回忆与研究。1982年,在查阅大量原始资料和访问的基础上编写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开始了学者对赣东北地区在1937年以前革命历史的全面的正式研究。该书

为进一步研究赣东北地区的革命提供了大体完备的框架和基础。其所开掘的深度仍然不够,但正是这本书所作的努力,才使得我们出发寻找新的研究方向时,不必担心被人指责为遗忘、缺失了一些重要的基本前提。

为了与《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配套,2002年11月唐志全、陈学明出版了《“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对“方志敏式”工农武装割据进行了专题研究。无论是史料、处理史料的角度,还是通过史料所达到的认识深度,均与以前的研究成果相持平。但是,他们集中周密地论证了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区别于其他革命根据地的五大特点(尤其是前四点),却是该书闪光出彩之处。

然而,从整体上看,唐、陈的研究呈现出徘徊不前的态势,反映了“自上而下的”、“宏观的”、侧重于分析评价革命根据地政策方针和革命领袖思想实践的研究范式,在推陈出新时所遭遇到的困境和艰难。这一领域的其他研究者也显露出同样的症候,比如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五期上的《论“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的基本特征及其主要经验》一文。也有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的,他们通过研究国民党方面如何镇压革命,试图为根据地研究别开生面。廖信春研究了国民党在江西的统治对根据地涨落的影响^{〔1〕}(也可参见万振凡、林颂华主编:《江西近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三和第六章的有关部分),而威廉·魏(William Wei)的《中国的反革命——国民党人在苏维埃时期的江西》(*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The Nationalists in Jiangxi during the Soviet Perio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5)则仔细研究了蒋介石在江西剿灭革命中的一些问题,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对赣东北等地的革命历史的了解。然而,“自上而下”的研究思路并没有因为他们把共产党换成国民党而有所改变。

1991年,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张静如首先在《历史研究》杂志上提

〔1〕 廖信春:《国民党在江西势力的消长与中央苏区的起落》,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议：“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他认为，应当“利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反映”。诚如一位学者指出，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倡议”。〔1〕何友良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以及林济的《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明清至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有关宗族社会在1920至1930年代革命时的情况的章节，就是在学术实践上进行的革命根据地史研究范式转型的最初尝试。

可是，知难行亦难。何友良、林济他们只做到了张静如所倡导的研究方式转换的后半部分，即描述了革命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各种表现。他们并没有从深厚的社会历史中寻找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源，或者说他们这样去做了，然而遵循的是某种庸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到处收集文献材料以证实农民生活的贫穷，臆断性地构建贫穷与革命之间、实际上并不是如其所是的那种方式的因果关系。而且，他们也仅仅是描述了革命在乡村生活中激起的各种现象，没有深究革命为什么会引起乡村巨变的，这场变化的内在的微观的机制又是如何运作的。因而，他们从研究的范式转变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初步的。不过，毕竟是筚路蓝缕，以启中国学界之山林。其实，瑞典学者达格芬·嘉图按照这种范式对华北平原上的抗日根据地所做的研究，也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突破。〔2〕

美国学者小巴林顿·莫尔在《民主与独裁的社会起源》一书中则突出强调了革命与小农社会结构品质之间深刻的内在的联系。然而他是在泛泛而论，而且试图以小农社会团结性的稀缺来解释中国几千年间所发生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另一美国学者凯末尔·希尔(Kamal Sheel)的《中国的农民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方志敏与信江区域的农民运动起源》(*Peasant Society and Marxist Intellectuals in China: Fang Zhimin and the Origin of a Revolution Movement*)

〔1〕 参见田居俭为何友良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所写的《序》。

〔2〕 参见〔瑞典〕达格芬·嘉图：《走向革命》，杨建立等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